

民国史学与宋学

——以陈垣先生为例

牛润珍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民国史学受清学影响,也受宋学特别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此在“七七事变”之后,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典型的史学家与史书是陈垣先生及其所著《通鉴胡注表微》。陈垣早期学术受清学影响较大,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抗战爆发后,学术方向转变,由清学转向宋学,通史以致用,撰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论证其爱国思想;抗战后期,始撰《通鉴胡注表微》,立足抗战爱国,发掘胡三省《通鉴》注中微言大义,陈古证今,论证国家至上与秉持民族大义的道理,由考证以通义理,重节义,为学经世致用,济物利民,重视文献、掌故与考据,以清学考据为工具,以南宋史学为归宿,使陈垣抗战史学得到了一个完美总结。

关键词:民国史学;宋学;陈垣;《通鉴胡注表微》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1-0147-07

民国史学在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沿着学术与科学的道路不断前行,主要受两股势力的影响,一为新学;一为传统学术。其受传统学术的影响也有远近两股力量:近者为清学,远者为宋学。民国史学继承清学传统,显而易见,言者论者亦多,而其对宋学尤其是宋代史学的借鉴、吸收、融汇与运用,则被诸多的具体现象所蒙蔽;特别是抗战爆发后,民国史学中的宋学元素远大于清学,学界对此似未有更多的关注。本文所论,旨在揭明宋学对民国史学的影响,然而论题较大,谨以陈垣(字援庵,以下称字)先生为例^①论述之。

一 缜密考证与宋贤规模

援庵自幼受清学影响较深,少时读张之洞《輶轩语》和《书目答问》,稍大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目录为步入学途之门径,这原本是清人初涉学问时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他自17岁参加科考,接受八股文训练,同时读赵翼《廿二史札记》,按“史法”、“史

事”重新编辑书之内容。科考制度废止后,他改学西医,学习解剖学。后加入同盟会,办报鼓动民众反清排满。所有这些都影响了他以后的学术与著述。又由于家庭的基督教信仰,他于1917年设想撰著《乾隆基督教录》,虽未获成功,但以此为契机,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考证元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里可温教即基督教聂斯托里派。该文由概念入手,清理文献有关记载,梳理教士东来、教规、教徒人数与人物、政府管理与优待、与异教关系、碑刻文物及与景教异同,最后归纳结论。推证严密,环环相扣,将信而有征的材料拼接起来,还原完整的历史事实,廓清其真象,由此引出可靠的认识和看法。这篇学术论文基本上奠定了援庵自己的独特学术风格。以后,他撰《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犹太教)、《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与《元也里可温教考》合称“古教四考”,又撰《元西域人华化考》、《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二十史朔闰

收稿日期:2012-07-08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985项目资助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牛润珍(1954—),男,河北成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等,使其学术风格愈益完善,其特点更加鲜明、突出。

援庵治学以考据为擅长,历来被视为20世纪新考据学派的大师。其学术风格与特点是:竭泽而渔地穷尽有关材料;信而有征地引用材料;排比材料,归纳类例,择其典型事例揭明某一条义理;思理缜密,依循事物发展的逻辑关系,步步推证,并与相类事物往还互证、比较,既能将研究对象所涉及的问题加以解决,又能使论题研究更加系统、全面、深刻、扎实,以保证整个研究过程、研究结论深具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他曾将自己的考证方法的形成归结为两点:一是清代考据的方法,一是早年学习西医所受解剖学的训练。援庵的考据由概念入手,又由概念考释而及事物本质、特点、发展、联系及影响。这既有清学的影响,又有宋学的因素。如《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的撰著,堪称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

《元西域人华化考》成书于1923年,是援庵前半生的代表作,倍受中外学人推重。是书八卷7万余字,卷目为:绪论(西域范围、西域文化状况、华化意义、西域人华化先导),儒学篇(西域人及基督教世家、回回教世家、佛教世家、摩尼教世家之儒学),佛老篇(西域词人之佛老、回回教世家由儒入佛、基督教世家由儒入道),文学篇(西域之中国诗人、基督教与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西域之中国文学、西域之中国曲家),美术篇(西域之中国书家、西域之中国画家、西域人之中国建筑),礼俗篇(西域之名氏、丧葬、祠祭、居处效华俗),女学篇(西域妇女华化先导与华学),结论(总论元文化、元人眼中西域人之华化、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虽为考证,然构架规模已远非清学所能牢笼。故陈寅恪于1935年2月为本书作序说:“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至于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1]239}

精密考证、实事求是与宋贤著述规模,是援庵于抗战之前的学术特点。其考据多受顾炎武、钱大昕、王念孙等清儒之影响,然又不步趋清儒,承习其求真务实用之学术精神与方法,摈弃其为考据而考据或证据不足而强作考据之陋弊。顾炎武针对明末凿空说经之陋习,指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2]79} 识字审音,由音

求义,引出清代汉学的兴盛。汉学家以汉代近古,贾逵、马融、郑玄等对经典的解释邻接孔子本义。魏晋以后,音韵叠变,字义不明,复经宋人臆解窜改,九经古音古义逐渐遗失,后人读经书已经分不清是孔子之经还是汉或唐宋人之经书。因此,惠栋、戴震等起而复汉学。惠栋欲就经书作《汉读考》,唯古是求,以汉为是;戴震借鉴惠栋以“求是”,由训诂通义理。按照这样的思路,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王念孙撰《广雅疏证》。王念孙训释《诗·终风》“终风且暴”曰“既风且暴”,又遍阅《诗经》,找出“终……且……”句型数条,以验证训释。王引之称此训释方法“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3]自序}。

清人训诂并非全都确当,甚至连惠、戴这样的大师,也有不靠谱的文字训释,捕风捉影,误引伪书。陈寅恪曾说:“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寡少,其解释尤为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个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系统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故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如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1]238}

学术界论述援庵学术渊源,多论及其对乾嘉诸老的继承与总结,甚或以其不擅长经学为短,孰不知清末民初经学衰而史学复振,史学关系国家与民族之兴最为切要,时代使命与学术自觉不允许援庵再步乾嘉诸老后尘。援庵虽无经学研究成果,然其史学论著能熟练引用儒家经典,说明他的经学造诣还是相当高深的。陈寅恪先生谙熟清代经学,对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又有深刻的体验,所以最能理解援庵学术。援庵从钱大昕那里学到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从顾炎武、全祖望那里得到“经世致用”、保留传统历史文化的思想和民族精神。顾炎武纠明末清谈误国之弊,提倡“经世致用”,借宋学反对王阳明的心学,其学术思想沿承宋学。援庵学术近承清学,远承宋学。1964年,他曾写信给一位读者,谈到其当年撰著《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动机,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4]818} 考据求真,求真以致学术思想之用,这是抗战前援庵学术的趋向。

二 由清学转向宋学

抗战爆发后,援庵的学术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为学术而学术,倡导“有意义史学”,以清学考据为工具,由考据通义理,讲究经世致用,用学术研究激发国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大义,为抗战提供理论和精神支撑,探索学术救国救亡的道路。援庵学术的变化也是随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抗战形势不断变化而逐渐演进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即已注意事功,教书课徒,授以顾炎武《日知录》,同时,撰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由辑本避忌“胡、虏、夷、狄”等字,揭示清代乾嘉时期文化专制背景下文臣士人的畏惧心态。“七七”事变,日、伪统治平、津,山河破碎,人民受难,汉奸助纣为虐,欺压同侪,甚至诱逼有气节的著名学者为日伪做事。这时,援庵正在读明清之际僧人语录,有感于现实,撰成《明季滇黔佛教考》,表彰明末遗民逃禅不事清朝的民族气节。1941年,日军既占据平津,汉奸们“得意扬扬,有结队渡海朝拜,归以为荣,夸耀于乡党邻里者”^{[5]后记},这让援庵十分厌恶。于是,他又撰成《清初僧净记》,借清初僧人木陈、玉林投降清朝横行恶事,斥骂汉奸无耻行为。《明季滇黔佛教考》与《清初僧净记》于形式上考佛教,实则借考佛教论政治,并非纯粹的佛教史迹考据。

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困守平、津沦陷区的一些学人,因无法忍受长期的生活困迫,无奈到敌伪机关、学校任职谋食,援庵对此颇焦虑。1941年,他又撰成《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考证金、元时期宋遗民在河北地区创建新道教,不事金、元的事迹,揭示其民族气节与精神。他说:“卢沟桥事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乃有感于宋金及宋元事,觉此所谓道家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诸之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事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固与明季遗民之逃禅者异曲同工也。”^{[6]重印后记}抗战最困难的时刻,援庵借历史研究,进一步论证只要坚守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用夏变夷,中国就不会亡。他说:“靖康之乱,河北冀舍为墟,士流星散,残留者或竟为新朝利用。三教(全真、大道、太一)祖乃别树新义,聚众训徒,非力不食,其始与明季孙夏峰、李二曲、颜习斋之伦讲学相类,不属以前道教也。迨儒门收拾不住,遂为道教扳去,然固汴宋遗民也。……三教祖皆北方学者,而能以宽柔为教,与金元二代相始终,殆所谓化胡工毕,于以西升者耶,不然,何其适

也。呜呼!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7]568-569}

全真、大道、太一之所以被称为“新道教”原因有三:一是三教主身份皆为“汴宋遗民”;二是遗民循道,其政治态度与旧道教不同;三是新教宗旨、传承不同于旧教。援庵通过河北新道教的研究,论证“夷狄无百年之运”。他说:“大道教诸人,百年之间,两遭亡国之痛,均能守西山之节,危行言逊,从容于乱离凶暴之中。盖自初祖以来,即深信‘夷狄无百年之运’……使子孙三四世不仕,则劫运必剥而复矣。”^{[7]649}新教苟全性命于劫运乱世,全真“以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大道“以无为清静为宗,真常慈俭为宝,其戒则不色、不欲、不杀、不饮酒、不茹荤,以仁为心,恤困苦,去纷争,无私邪,守本分,不务化缘,日用衣食,自力耕桑贍足之”^{[7]641},他们隐伏山中乡下,聚徒训众,刊行《道藏》,留读书种子。“何为留读书种子?全真家可贵,非徒贵其不仕也,贵其能读书而不仕也,若不读书而不仕,则滔滔天下皆是,安用全真乎!若因不仕而不读书,则不一二世悉变为无文化之人,此统治者所求而不得也,故全真虽不仕,书却不可不读。”^{[7]596}读书种子不绝,才能留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方可用夏变夷。

然而有些人寡廉少耻,认贼作父,最终身败名裂。援庵尝例举宋金之际刘豫的下场以警示世人说:“豫废后,拘于琼林苑,常蹙额告拑懒云:父子尽心竭力,无负上国,惟元帅哀怜之。拑懒曰:‘刘蜀王,刘蜀王!尔犹不知罪过,独不观赵氏少主出京日,百姓燃顶炼臂,香烟如云雾,号泣之声,闻十余里,今废了尔后,京城无一人为你烦恼,尔误作人,犹自不知罪过。’豫遂默尔语塞。”^{[7]583}汉奸走狗人人唾弃,甚至连其主子亦所不齿,世人读书至此,能不省悟吗?

同样,对于全真教末流“晚节不终”堕落为“市朝鬻道之徒”,援庵亦予以贬黜。他说:“道者以安贫守贱为尚,志意修则跻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7]626}然全真末流贵盛,“居京师,住持皇家香火,徒众千百,崇墉华栋,连亘街衢,通显士大夫,洎豪家富室,庆吊问遗,水流而不尽,天下州郡黄冠羽士之流,岁时参请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尝绝也。道宫虽名为闲静清高之地,而实与一繁剧大官府无异焉”^{[7]626},这完全

违背了全真教创建的初衷。“全真之兴,其初不过欲溷迹嚣埃,深自韬晦,以俟剥复之机而已,岂期巫祝之术,为幼稚民族所欢迎,竟得其国王大臣之信仰,尊之以宗师,崇之以冠服,侈之以宫观台榭,如是其盛乎!”^{[7]626}至此,道流腐化,与新朝同流合污,使援庵深为叹息愤慨,这也是有感于时事而发。

援庵撰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的思想性较之《明季滇黔佛教考》更进一层,从其学术源流上讲,可以这部书为标志,援庵学术已经由清学转为宋学,而其宋学的巅峰之作是他于抗战后期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

三 新宋学之杰作——《通鉴胡注表微》

援庵著述最具宋学精神者当数《通鉴胡注表微》。这是一部极富史学思想并且具有极高理论价值的学术专著,它将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援庵论及撰著此书的缘起与目的,曰:

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唯胡氏复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弃去;且喜其字大,虽夹注亦与近代三号字型无异,颇便老眼。杜门无事,辄以此自遣。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程颐)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为文(天祥)、谢(叠山)、陆(秀夫)三公同年进士,宋亡隐居二十余年而后卒,顾《宋史》无传,其著述亦多不见传。所传仅《鉴注》及《释文辩误》,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故言浙东学术者,多举深宁(王应麟)、东发(黄震),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余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8]小引}

“臣妾之辱”、“亡国之耻”,奇耻大辱,刺痛了胡三省,六百六十年之后,又刺痛了援庵,故欲借胡注,全面、系统阐发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史学思想。

《通鉴胡注表微》前十篇论史法,包括了史家著书的政治立场、态度,是非判断,以及著述规范等。

其首列“本朝篇”,考证胡注对于宋朝之称谓,曰:“本朝谓父母国。人莫不有父母国,观其对本朝之称呼,即知其对父母国之厚薄。胡身之今本《通鉴注》,撰于宋亡以后,故《四库提要》称之为元人。然观其对宋朝之称呼,实未尝一日忘宋也。大抵全书自四十卷至二百三十卷之间,恒称‘我朝’或‘我宋’,而前后则率称‘宋’或‘宋朝’,吾颇疑为元末镂版时所改,其作内词者,身之原文也。”^{[8]1}著史当对自己的祖国忠贞不二。有国有家之时,人们对此似不措意;山河破碎、国家败亡时,祖国显得尤为重要。援庵著书,列“本朝篇第一”,显而易见,其国家意识第一。

史家借著史寄托心志,褒贬劝戒寓具事论,因此书法规范也是史家十分重视的,故《通鉴胡注表微》列“书法篇第二”。援庵曰:“《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时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身之推论《通鉴》之书法为多,其有关全书义例及史文构造、史料采取……固与《通鉴纲目》等之所谓书法,涵义颇殊也。”^{[8]20}

著书如何征引前史?《汉书》记宣帝神爵元年汉吏无故杀人,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叛汉。《通鉴》曰“怨怒”。胡注曰:“《通鉴》略改班《书》之文,成一家之言。”援庵进一步发挥说:“凡引书声明引自古人者,可略而不可改,裴松之《三国注》是也;未声明引古人而用其语者,可隐括为一家言,范蔚宗之《后汉书》是也。温公之《通鉴》,盖范书之类,亦即班书用《史记》之类。”^{[8]23}

关于编年,《通鉴》有“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胡注曰:“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贵乡公方改元正元。《通鉴》以是年系之高贵乡公,因书正元元年。”援庵曰:“古时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通鉴》患其纷错,乃创新例,必取末后一号冠诸正月上,当时已有议之者,说详《日知录》‘史书一年两号’条。余撰《二十史朔闰表》,凡在年中改元者,不书其元年,而书其二年,睹二年即知有元年,而前元之末年,不致被抹杀也。”^{[8]26}

援庵曰:“史文之构造,亦谓之书法,固与褒贬无关。”^{[8]24}《通鉴》书法,虽不尽关褒贬,然其不记王莽改正朔,删削桓玄年号,书东晋帝逝世为“崩”,自有义例规范。胡注对此一一揭明,援庵表胡注之微,

曰：“然则续《通鉴》者，于南宋诸帝，亦可以先尝混一书‘崩’。身之盖思及本朝，而心痛国力之不振也。”^{[8]25}至于《通鉴》不书桓玄年号，援庵曰：“然乱臣贼子可以笔削惧；敌国外患不可以议论弭。两宋之所以不亡于臣子，而皆亡于敌国也！悲夫！”^{[8]26}两宋史学之盛与国力之弱，面对强敌入侵，一起破灭。与其空话大论，倒不如躬身做些实事。

援庵曰：“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8]37}故于《通鉴胡注表微》列“校勘篇第三”，总结胡注校书方法。然援庵钩稽胡注校书方法，不单为方法，而是从方法中发掘其爱国精神。《通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卿曰：“商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胡注曰：“以上下文观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援庵曰：“此条是纯理校。今本《荀子·议兵篇》，与《通鉴》所引者不殊，《通鉴》‘殷’作‘商’避宋讳耳。而身之以为‘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意别有在也。荀子言‘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谓待新服之民，无异周人也。身之欲易为‘无异商人’，则谓无异其在故国时，盖深感变于夷，不若仍为夏也。其说甚美，然无所据，故谓之纯理校……身之之意，盖宁为亡国遗民，亦不愿为异国新民也。”^{[8]38-39}

胡注的历史解释也极具思想与精神，《表微》列“解释篇第四”，发掘胡注精神内涵，使其思想熠熠生辉。《通鉴》周赧王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妇于秦。温公论曰：“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仇。”胡注曰：“谓楚襄王父死于秦，是仇雠之国也，忍耻而与之婚。”援庵曰：“此有憾于宋高宗之忘仇也。宋高宗父死于金，忍耻而与之和。《朱子文集》七五序魏元覆编次绍兴八年戊午谗议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若夫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仇。’此明为南宋君臣言之，身之之解释，亦犹是耳。”^{[8]56-57}日人占领东北，培植伪满，命溥仪娶一日妇，古今一辙。

《通鉴》周赧王四十九年，应侯使须贾归告魏王曰：“速斩魏齐头来，不然，且屠大梁！”胡注曰：“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而尽杀城中人为屠，亦曰洗城。”援庵曰：“屠城之义甚浅，而重言以释之者，有痛于宋末常州之屠也。德佑元年十一月，元兵围常州，知州姚嵩、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力战固守，皆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明丘濬《世史正纲》亦论之曰：‘作《元史》者谓伯颜下江南，不杀一人。呜呼！

常州非江南之地邪？伯颜前此潜兵渡汉，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城陷之日，尽屠戮之，止有七人伏桥坎获免。残忍至此，而中国之人秉史笔者，乃亦曲为之讳，至比之曹彬，岂其伦哉！’丘濬生异代，犹为此论，文山、身之，接于耳目，其感怆为何如耶？”^{[8]57}战争惨酷，人命如蚁，援庵特表此节，也有感于日寇入侵，在中国制造了一桩桩灭绝人寰的惨案。

《通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胡注曰：“义不为秦民也。”援庵曰：“《史记》注家多矣，‘周民东亡’一语，周秦二纪皆载之，迄无注者，身之独释之曰‘义不为秦民’。区区五言，非遇身之之时，不能为是注也。”^{[8]58}胡三省为南宋遗民，义不仕元，与周民身同感受，方能注意及此。

《通鉴》汉高帝十一年，陆贾说尉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胡注曰：“背父母之国，不念坟墓宗族，是反天性也。椎髻以从蛮夷之俗，是弃冠带也。”援庵曰：“此为宋末诸降人言之。”^{[8]59}此又为日伪汉奸言之，汉奸投降日寇，背叛祖国，也是反天性。

国难显忠臣，史书表忠义。《通鉴》汉和帝永元四年，华峤论班固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胡注曰：“谓不立忠义传。”援庵曰：“此条有章怀注不用，而别注曰‘不立忠义传’。吾始疑忠义传前四史皆无之，何能独责班固！继思《汉志·阴阳家》有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师古引刘向《别录》云：‘传天下忠臣。’是固之先有忠臣传，特固之不采耳。且忠臣应列《春秋家》，何以列《阴阳家》？王深宁曰：‘《七略》刘歆所为，班固因之。歆，汉之贼臣，其抑忠臣也则宜。’语见《困学记闻》十二。深宁所论，足与身之相发明，此宋季浙东学说也。异日李邕撰《西汉节义传》、万季野撰《宋季忠义传》。皆此学说有以发之。”^{[8]60-61}浙东学术由经入史，注意事功，最重切用，借著史表彰忠义，振奋世人。守节持义，亦是其事功之一。

胡三省亲历宋元易代，家破国亡的切身感受使他对于家与国兴亡的认识尤为深刻。《通鉴》晋永和二年，会稽王昱与殷浩书曰：“即时之兴废，则家国不异。”胡注曰：“言国兴则家与之俱兴，国废则家与之俱废也。”援庵曰：“《公羊》僖公二十一年传：‘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公子目夷复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仲尼弟子列传》载：‘夫子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

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人与国同休戚,夫子之训也。”^{[8]63}孔子如是说,顾炎武也如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个人、家、国共兴亡、同休戚的道理,被孔子、胡三省、顾炎武、陈援庵阐释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通鉴胡注表微》前10篇,本朝、书法、校勘、解释四篇外,还有避讳、考证、辨误、评论、感慨和劝戒篇,此10篇虽言史法,也包含史家著史的立场、态度、思想、理论与精神;后10篇包括治术、臣节、伦纪、出处、边事、夷夏、民心、释老、生死和货利篇,所讨论的史事涉及政治、军事、民族、民心、宗教、人生、经济等。其《治术篇》说:“治术者致治之术,即身之政论也。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8]198}抗战时期,援庵先生闭门著书,寄托爱国心志,亦何尝忘情政治。

援庵不满蒋介石专制政治,于《治术篇》借史事论政治,说:“专制之极,使人不敢称其恶;今乃不许称人善,亦岂是非之公耶!”^{[8]214}“人非好为盗,亦不乐从盗,盗之起多由于不足与不平。”^{[8]215}他在《民心篇》中又说:“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夫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其故可深长思也!”^{[8]332}“民主政治未建立之时,以天下为私物,忌疆吏之得众,然则疆吏之虐用其民,乃君主所深喜也……靖康元年,李邦彦等之潜罢李纲也……谓纲为民心所归,帝亦疑纲而不可解,宋遂不得不南渡矣。”^{[8]336}失去民心,又忌忠臣得民心,宋南渡,继又亡于元,历史教训惨痛。

生逢乱世,生命无保障,生死存亡考验着每个人。如何对待生与死?援庵先生在《生死篇》中说:“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平世犹不甚觉之,乱世不可不措意也……胡身之生乱世,颇措意于生死之际,故注中恒惜人不早死,以其生无意义也;又恒讥人不得其死,以其死无价值也。”^{[8]366}“可以死而不死,可以不死而死,生死都无是处也。”^{[8]377}

面对外敌入侵,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援庵答曰“爱国”,国重于亲与友。他在《伦纪篇》中说:“君臣、父子、朋友,均为伦纪之一。必不得已而去,于斯

三者何先?为国,则不能顾及亲与友矣。伪齐之立,有背祖国而从刘豫者,自诿牵于私谊也,亦终与刘豫偕亡矣。”^{[8]243-244}人不能以私情害公谊。

援庵先生一生治学,前半生重视《元西域人华化考》,后半生重视《通鉴胡注表微》,尤其是后者,自视为一生学术之总结,治学历程的记里碑。“九一八事变”之前,他秉承乾嘉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专事缜密考证,走的是清学的道路;“七七事变”之后,亡国灭种的危难深深刺痛了他,学术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以考据为工具,致力于经世致用,通过严密的历史考证,阐释国家至上、民族大义最重的深刻道理,自觉地担当起保国保种的历史责任。陈古证今,以古讽今,劝诫人们勿悖民族大义。所有这些道理都是建立在严谨而科学的研究与论证基础上,语重心长,极具说服力,即便是铁杆汉奸阅读此书,也不能不动摇其心。此时的“援庵之学”已由清学转向了宋学,具体说来,这主要是受了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

清儒由训诂以通义理,戴震晚年病重时,方悟出义理的重要。援庵不仅得到了清学的科学方法,还得到了清学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并将其进一步升华,由考证以通义理,用民族大义、国家至上之理保种救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借宋学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寅恪先生为援庵《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1]240}他又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又曰:“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1]245}蒙文通撰《中国史学史》曰:“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其在北宋,一排唐人博综之学,研精义理,超绝古今。于是司马、欧阳,前驱拥篲,逮于南宋,胜义纷陈,此史学之一盛也。”^{[9]7}何炳松在《浙东学派溯源》中说:“南宋之世实吾国学术融会贯通之一大时期。自古以来儒释道三大宗门之思想至是皆始成系统,而儒学一派独演化而成所谓浙东之史学以迄于现代。故此一期实为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10]自序}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讲究义理,重气节,为学经世致用,济物利民,重视文献掌故,重视考证,所有这些都经援庵撰著《通鉴胡注

表微》得到了完美演绎。《通鉴胡注表微》源出宋学 而高于宋学，亦可如寅恪先生所曰“新宋学”。

注释：

①目前对此有所论述的为：陈其泰先生《陈垣与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纪念陈垣先生诞辰 130 周年》[《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一文。

参考文献：

- [1]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2]顾炎武. 顾亭林诗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王引之. 经传释词[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2.
- [4]陈智超. 陈垣往来书信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5]陈垣. 清初僧净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陈垣.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7]陈垣.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M]//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之一.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8]陈垣. 通鉴胡注表微[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 [9]蒙文通. 中国史学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0]何炳松. 浙东学派溯源[M]//何炳松文集: 第四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and Song Studies

NIU Run-zhen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Historiograph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studies of Qing, but also the studies of Song, especially those of Eastern Zhejiang area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uch influence became more obvious after the July 7th Incident of 1937. Chen Yuan and his work *An Elucidation of Hu's Annotations to ZiZhi TongJian* could be a best example. Chen Yuan wa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studies of Qing in his early years, which led him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and strive for perfecti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s his patriotism being stimulated, his academic thinking also turned to Song style which emphasizes practicality and he wrote three books, *A Study on Buddhism in the Area of Yun Nan and Gui Zhou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Admonishment from Monks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A Study on the New Daoism of Hebei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t the end of the war, he wrote *An Elucidation of Hu's Annotations to ZiZhi TongJian*. In this book,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purpose of Hu to annotate *ZiZhi TongJian* was also to show his patriotism toward his country. With textology of Qing as its tool, and pragmatism of Southern Song as purpose,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en Yuan was established perfectly.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ong studies; Chen Yuan; *An Elucidation of Hu's Annotations to ZiZhi TongJian*

[责任编辑: 凌兴珍]